

从“欲新民”到打造“舆论之母”

——20 世纪初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一个环节

殷国明

内容提要 进入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被带入一个新的社会场域和文化语境之中，其社会性和变革意识越来越趋于强烈和突出，从梁启超的“欲新民”之说，进一步转为提出打造“舆论之母”，接以痛失“舆论之母”的地位，为革命党人所接替。这体现了中国社会变革对于文学批评新的诉求，不仅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呐喊出了先声，营造出了氛围，也为重新思考和把握中国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提供了某种从文化和意识形态切入的路径。

关键词 欲新民；舆论之母；文学批评；梁启超；《民报》

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之所以具有先声夺人的效应，应当说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其实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合奏”，是多声部的交响乐，不仅有社会和时代变迁的历史积累，也有经济与文化发展失衡的思想落差；不仅可视为对西方文化冲击、启发之应对，还饱含中国人自身长期受压抑的心理郁结之内蕴。如此等等，都为中国进入一个“发声”时代提供了契机和机遇，使文学批评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异军突起成为可能。

当然，这一切也促使文学批评本身发生了变化和转型，似乎以往温柔敦厚的面目，在一刹那间就变为满面肃杀，义正辞严；从过去偏于内敛的精神气质，一下子调转方向，转为勇于、乃至急于参与社会生活的外放型模式。在观念选择、言说方式和话语形态、修辞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变化。换句话说，无论是所谓“批评时代”的来临，还是文学批评之能够先声夺人的态势，都是通过特定的思想、话语和逻辑方式得以践行和实现的，其中所蕴含的时代、历史征兆和奥秘，就隐藏在这些具体的批评实践和展演之中。因此，对中国 20 世纪文学批评文化功能和效应的探究，就不能不立足于文化和批评之间的关系加以推展，继而深入到文学批评的论述策略和话语方式之中。

一 政改诉求的驱动： 走向意识形态的文学批评

从中国历史变迁的角度着眼，文学批评之崛起，实为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要求之应和与共奏，以一种特殊方式迎合和反映了中国特殊的文化状态和历史要求。这就是说，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大变革的前夜，甚至已经聚集了足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心理资源和能量，但是，一时还未能产生有足够感召力的思想和文化力量，构成改变中国思想状态的文化契机，为社会变革提供整体性转型的选择和方向。这时候，如果没有西方列强的破门而入，使得中国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局，甚至于陷入“被开除球籍”之焦虑的危机状态，中国社会变迁很可能会继续在以往“农民起义”和“改朝换代”中循环往复，难以真正进入“天下至变”的时代。

所以，在这种历史语境中，西方文化的进入促使中国打破了这个瓶颈，不仅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性变革产生了刺激和催生作用，而且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提供了想象和建构的蓝图。其中，最显著的表征无疑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其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形成和确立，而这个过程亦典型体现了 20 世纪中国变革的

最显著的特点，即“政改驱动”自始至终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扮演着激发、驾驭和掌控一切的角色。

“政改驱动”显示了诸多问题背后的推力——其时，政治是所有文化变动的推进器和发动机。所谓政治，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关于治国理政和权力机制的学问和实践。而关于政治在人类文化，尤其是学术和思想发展中的核心价值与意义，恐怕在孔子和苏格拉底时代就已经成形，历经近三千年，至今依然没有失去意义和效应。

急于变革社会的政治激情，无疑是促使文化意识形态日益膨胀和文人热切发声的思想激素。于是，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发展中，出现了明显的“政改诉求”与“意识形态先导性”相互支撑和相得益彰的情形。由于政治变革首先需要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支持和造势，才使得文学批评能够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变革的“马前卒”和“敢死队”。也正因为文学批评能够担当如此重任，才使得自己能够在20世纪风光一时，经历诸多历史磨难，亦谱写了如此多的故事和传奇。

文学批评和政治之间的这种契合和互动关系，也为人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就世界范围来说，随着公民政治、社会民主和大众流行文化的崛起，传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经典化和精英化意识逐渐淡化，甚至变得不合时宜，而政治的文学化，乃至娱乐化倾向则日益加剧，蔚然成风。很多政治家借助艺术创作和文学作品阐明己见，甚至以此作秀，用文学性的修辞方式来宣传政治主张，推广执政理念；至于在公共场合借助各种媒体，来一番激情演说，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司空见惯的文化景观。这股潮流在世界范围内催生了众多能够激发人们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进一步发挥实践效力，从而影响甚至改变现实走向的文化产品和作品，它们既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显明表征，也是文学的，甚至文学批评的精彩展演。

“新”的文学批评，正是在这种语境和潮流中应声而起。其实，在近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先声夺人，最初实从政论开始。它源自对于政治变革的诉求，既迎合了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也符合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和实际状态，同时不断向“文学化”靠拢，借用文学方

式和元素发声和立言。这种“政改诉求”的表现和表达，在不同社会状态中，有不同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重心，如果是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其可能以治国理政为要务，但在社会变革的非常时期，则会转移到对权力及其体制的质疑、颠覆等诸多方面，在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形成了尖锐乃至极端的话语权争夺、对峙甚至战争状态，随时可能从思想、观念和话语范畴，转换到用行为、肢体和暴力方式继续进行。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亦不断强化其社会责任和历史担当意识，从过去注重文学鉴赏、品味和知人论世的视域，开始转向注重社会效应、思想传播和宣传方面。对于这种转向，梁启超、刘师培、鲁迅、茅盾、朱自清等，都有不同角度和层面的认识和论述。从文学本体来说，这种转向不仅意味着对于文学功能、效用，乃至价值的新的发现，还表现了一种文化立足点的转移，即不再过于注重文学作品和现象本身的质地与特点、以及其艺术承传和美学效果，而是关注其外在社会品相和思想意义，并由此评价和判断文学及文学现象。

自然，在中国传统文论资源中，不仅有注重鉴赏、品味的特点，同样也有与文化意识形态，乃至政治互动的诉求。例如孔子文学思想就讲究兴、观、群、怨，就体现了一种文学与政治相互融通、互动的意识。而在梁启超的文学思想中，同样融注了这种中国传统文论意识。即便在一个社会剧变的时代，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创新依然体现了古今文学的交接和传承，其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批评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先河，而且在20世纪初成功构建了一种把政治与文学、社会效应和艺术诉求密切粘连在一起的批评模式，在高扬文学和艺术价值和效应的同时，把社会变革诉求和政治价值观，推展和镶嵌到了文学之中，实现了文学与意识形态在新的文化语境中的互动和融合。

这种情景，在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中皆有展演，是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向政治化、社会化和意识形态化转型之滥觞。

这是因为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开始把中国

社会变革的焦点从政治体制转向了社会文化,从过度依赖上层权力阶层转向了社会大众,尤其是期待国民素质的培养和建设——也就是“欲新民”学说的提出。正是为了实现这种“欲新民”的企图,1902年2月8日,梁启超继《清议报》后,在日本创办了《新民丛报》,大力推广和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从其办刊宗旨即可看出,这是一份宣扬和推广“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报纸,而所开出的药方就是,用“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治为附从。……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①。这种依仗公共传播媒体,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②的公共价值理念,凸显了当时中国变革的文化转向,一方面显示出从政治和实业向文化与意识形态转移的趋势,另一方面也为文学批评的社会功用化、功利化乃至工具化提供了新的滋生空间。

从《新民丛报》第1期推出的《新民说》可以看出,梁启超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崇圣尊经的模式,不再托古以求改今,而是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由此一改过去把中国未来之希望寄托于政制变法,甚至最高统治者一人之意愿的想法,把中国不能“屹然强立,有左右世界之力”的原因,一下子转移到了国民素质方面,认为“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所以“新民”不能不是中国当时由弱转强的“第一急务”。

这种转变积淀了梁启超从事政治变革事业的切身体验和切肤之痛,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深刻的社会认知,具有跨越文化局限和历史时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应当注意,在这种以政治意图先入为主的论说和论述中,潜藏着过度阐释的危险。由于过度强调“欲新民”的作用,不仅有可能忽略,甚至遮蔽了自己以往强调的政治权力和体制的重要性,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潮有所漠视,对于时下风波诡谲的时势变幻缺乏必要的理解,且显示出了在阐释文本乃至一切可供阐释之物时,已然先存“意图先行”“观念先行”的思维定势。

在这种思维定势中,不仅文学,而且几乎所有文化资料和现象都有可能被“征用”,成为实现

“欲新民”的手段和途径,用以证明预先设定,不容质疑的观点和意图。

“新史学”之说就蕴含着这种不容分说的极端逻辑,一方面,它破除了既定的旧的历史观念的禁忌,突破了传统的历史叙述框架。另一方面,为了突出其“新”,采取了简单的二元对立判断方式,几乎完全切断了新旧之间的历史联系。例如,对于所谓新史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分野,梁启超的判断难免有过度 and 偏激判定之嫌: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

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③

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于“旧史学”的弊害和“新史学”的价值,采取了最大限度的由己心出发的目的性阐释,不仅认为中国史学著作“难读”“无感触”,更指出其“无有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的功能和作用,继而呼吁:“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④(文中着重号为原刊所加)从文中作者所加着重号就可看出,梁启超之所以倡导“新史学”,甚至可以推广到其他学说,都是为激起人们爱国激情,达到振兴中国之目的。由此,学术价值判断几乎完全以政治效用为唯一依归,文学价值评判几已全然与政治诉求化为同体。

二 互动与变体: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化担当

此时,梁启超不仅意识到学术在促进社会变革中的重要意义,也开始关注到文学,并极力促成政治与文学的结合和联姻,期待用学术、学理和文学的方式打开中国社会变革与进步的新天地。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孕育和隐藏着中国思想学术的转机,文学批评的蜕变也在悄然无声中进行。随着体制内政治变法的夭折,梁启超开始借助文化和学术来助推社会变革,他从日本等国家的实践中,意识到了文学在政治变革中的效应,并不断开掘其中的文化能量,大力张扬“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意义,进一步拓展、引进和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广阔面相,注重政治理性与文学

批评的互动效果。

马克思和尼采或许就是在这种情境中进入梁启超眼帘的。1902年10月16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一文中,就关注到这两位当时在西方最有影响、也最具叛逆性的思想家,他称马克思(文中译为“麦喀士”)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称尼采(文中译为“尼志埃”)为“个人主义”,说马克思认为“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数少之强者所压伏”^⑤,即为当时学界所瞩目。

而就在《新民丛报》第1号上,梁启超还用诗表达了自己励志改革的决心:

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
誓起民权移旧俗,更挈哲理牖新知;
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语谁;
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⑥

这首诗正好附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之后,表明梁启超变革社会的思想此时发生了一次重要转换,即从直接的政治改革路径转向了借助思想学术的力量,因为他从历史中发现了新的“文明进化之迹”,例如就欧洲近世以来社会变革来说,梁启超就认为,其首先来自于文化学术之兴盛,人们“乃大从事于希腊语言文字之学,不用翻译,而能读亚理士多德诸贤之书,思想大开,一时学者不复为宗教迷信所束缚,卒有路得新教之起,全欧精神,为之一变”^⑦。

于是,《新民丛报》不仅成了梁启超推广自己政治主张、以学术之力推动社会变革的平台,而且也是积极谋求与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互动,增强传播效应的通道。梁启超不仅推出长篇政论《新民说》,大力倡扬和宣传独立、自由、平等、公正,以及爱国、爱社会、爱民族的思想,从正面激励人们树立自尊、进步、利群以及进取冒险、奋发图强的意识,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没落和腐朽因素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可说已然早于“五四”话语,开启了“国民性批判”的先河。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与韩文举、蒋智由、马君武等人,于1902年11月,创办了附设于《新民丛报》的文学刊物《新小说》,并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把文学批评为社会变革造势的功能,提高到了观念和理论层面加以阐释,进一步打开了文学政治化、社会化

和意识形态化的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体现出更为激烈的革命诉求,并以过度甚至极端的阐释方式,开始从政治变法的层面向整个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蔓延,逐渐渗透和扩展到了更为边缘和细末的领域,并通过学术研究表现出来——由此,也形成了文学批评在中国独特的“泛化”现象,出现了文体多样化、杂文化的情景,批评意识几乎无孔不入,与各种非文学现象、话题和文体纠合在一起,其中既有政论性文章,理论性阐发,对时下民心的呼吁,对未来国况的诉求,亦有通过随感、杂记、书信、日记、回忆、甚至诗文创作中的直抒胸臆、借题发挥,几乎都能够以批评面目呈现,或者发挥批评的功能,与所谓“对文学文本的阐释”难解难分,完全跨越了学科、领域和文体类型的界限,以多种文体的千钧之势直接突入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

在20世纪初,这种情形不仅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而且也开始扩展到整个文化和学术研究范围,即便在文章学、文字学等看似与当下社会实际相隔甚远的领域,也出现了相应的反应,由此,以学术变革带动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转变,又以此类“转变”作为“反作用力”,促使治学理念在变革之路上再行推进。即便是在看似“沉潜往复,从容含玩”的治学领域之中,也不时以耸人听闻或激动人心的话题和论辩方式,在学界带动,在现实层面搅动着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神经。

而一向不被注意的是,这种过度或极端阐释的论述定势,不仅表现在倾向西化、鼓吹新思想的激进和激烈言说中,也出现在主张恪守传统、倾向守成的文化论说中。或许可以把后一种呈现,理解为一种文化思想的反弹和回应,意欲通过立足本土文化的学术建树,来驳斥和矫正前一种倾向的滋生蔓延。为了使论说显得更加有力,后者在思维定势和论辩推演方面毫不承让,丝毫不减过度乃至极端阐释的力度。

例如,在20世纪初,由于西学和新观念、新话语、新名词的引进,语言文字之学一度成为学界热点和焦点,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都投入了论辩,实际上,可说在此时便已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语言文字变革的大幕。之所以这样说,不仅在于这场论辩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碰撞、新旧文

化开始分庭抗礼的新语境中进行的,而且在于其所显示出的,是与以往中国传统文章学、文字学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在20世纪初,此种论说一开始就毫无温柔敦厚的中庸色彩,极力渲染中国社会和文化所面临的危机状态,一下子就把语言文字推到了关乎“种姓存灭”、“国家兴亡”和“文化复兴”的境地,继而也赋予相关语言文字的研究和守护以“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语)的政治决定意义,渲染出一种不能不就此决一死战的悲壮气氛。

由此,历来被视为“小学”,在古籍中孜孜寻求推衍历程的语言文字也一跃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敏感话题。1903年,邓实^⑥在《政艺通报》上发表的《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就显示了这种论辩气势。首先,这是一篇充满危机、忧患,甚至恐惧意识的论文,为整个论文的过度阐释提供了思想氛围;其二,在这篇论文中,“独立”成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所在,“不独立则苦海酷酷沦地狱而永幽,能独立则铜像巍巍于青云而直上”^⑦。其三,正是因为将之与整个国家命运紧密勾连,借助“中国独立”的重要性,语言文字的“独立”就变得非常重要,不仅是文化家园的根基,关乎中国人种的纯灭,而且在全球化文化竞争中,亦是最终决定胜负的必争之地。

把语言文字之争,直推到如此重要、决定性的文化前台——这似乎比西方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早了很多年,不能不说为日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发生营造了氛围。正是因为邓实意识到,这种语言文字的危机可能会直接影响中国文化和精神元质,使得后者有可能不断被消磨,从而使得国人在现实生活层面“堕入苦海”,所以意欲激起学界对于语言文字状态和问题的重视。不仅如此,也正是在这种由先置的危机和忧患意识诱发的论述中,语言文字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被层层放大、节节拔高,甚至被带入了文化和意识形态场域的战场,成为20世纪中国乃至全球化“文化战争”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例如,邓实就特别强调:“其亡人国也,必先灭其语言灭其文学以次灭其种姓”,并把这种危机直接落实到了当时的世界情势中:“哀哉!是故古之灭人国者,伤百万之兵,糜大万之财,龙争虎战,相屠戮数十载,然后仅乃克之;今之灭人

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湮人国圯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⑧

这或许是中国学术界把“文化”“文字”与“战争”“人种”直接联系起来的 earliest 提法,也是最早把“文化”“文字”拖入战争和战斗思维态势的学术表述。而令人有点匪夷所思的是,竟然是语言文字、文学,成了引发这场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文化战争的导火线。既然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文化战争,那么使用何种激进和极端的论述和论辩方式,把论题及其意义强调到何种程度和高度,皆不再有任何推论的底线和界限,由此也成为此后文学批评和论辩中“无限上纲上线”的动因之一。

此时的邓实不过25岁,比1918年写《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年岁还小。

新文学运动终于在十几年后,将此类观念在整个文化领域全方位引爆。实际上,后来的白话文运动不过是从相反方向,重现或重演了这种过度或极端阐释的逻辑。例如鲁迅,尽管用一种极其决绝的方式来反对一切“保存国粹”的论调,但是他的恐惧却与邓实、章太炎当年有相通之处:“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⑨此类论述背后的推演逻辑,同样是将“语言文字”直接与“国家命运”相勾连,这实则与早年的邓实并无二致。

由此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中过激、激进和极端的思维模式,并非最早来自于“五四”激进、极端和激烈的文学思潮,更非肇端于“白话文”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论说,而是在十余年前便已然浮现出的极端的文化危机和忧患意识中孕育和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倡导引进西方文化、打破传统文化禁锢的思想和思潮中,也体现在拒斥西方文化、誓死捍卫中国“国粹”的挣扎和抗争意识中。

三 打造“舆论之母”:关于文学批评的使命意识

可见,在从“政治驱动”向“文化先导”、继而向“思想和意识形态先导”的转换中,不仅文

学与政治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语言文学的意义和价值开始变得醒目,而且文学批评在文学与中国社会变革,尤其与政治之间的链接和桥梁作用,也变得愈发突出,最终催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学批评时代。

从这个角度来说,借助批评“造势”,不仅与中国近代社会和文化巨变相伴而生,而且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气象和文化策略,这就是借助和依托公共文化平台和载体,以最醒目的方式,谋求在公共文化场域生成最大效应;其不同于个人的“怒吼”、“长啸”甚至“呐喊”,而是通过一种群体和团体的形式,发出声音,营造氛围,以“群”共建合力,逐渐在文化和公共文化场域凝聚人心,形成共识,图求占据文化思想高地,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引起更大反响。

这或许是人类进入文化传播时代的产物,体现了一种社会化的、多种文化因素参与的综合呈现和联动效应,使舆论建构和传播成为社会变革、乃至革命的推进器和发动机。显而易见,通过政治与文学的结缘和互动,并以文学批评方式来造势,以获得政治、经济、军事等方式无法达到的文化效应和效果,这是20世纪历次社会变革和政治变动的前奏。

因为要造势,要影响人心,要形成气候,就意味着在公共文化场域搭台唱戏,就要办学会,办报刊,搞演讲,发宣言,聚人气,首先要形成一种整体性的氛围。实际上,社团与办刊之结合,或者说同生共长,相得益彰,是近现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革的创新之举,其不仅打破了以往专制政治权力对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而且意味着一批文化人从以往政治和权力框架中的脱颖而出,开始谋求属于自己的声音和地位。

期间,社会和报刊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原本就表达了一种通过公共传媒造势的欲望。在20世纪初,诸种因素的共同参与形成合力,使得此类机遇不断涌现,渐成气候,造就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结社和办报的第一次热潮。1903年,黄兴在长沙与刘揆一、章士钊、宋教仁、陈天华等人秘密集会,发起组织华兴会,他在讲话中就指出,在当时“军学界革命思想日见发达,市民亦潜濡默化”,“炸药既实,待吾辈引火线而后燃”的情况下,最需要的就是“审时度势,或

由会党发难,或由军学界发难,互为声援”^⑫。而到了1903年3月,他在《〈国民〉月刊出世词》中强调,在“登高丘而四望,专制黑雾既弥漫于神州,雨晦风潇,长夜不旦”的情形中,刊物一定要成为“为传播文明之利器,趋世界之潮流,救中国之危弱”,起到“发挥党纲,指导国民”^⑬的作用。

打造“舆论之母”的意识,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应运而生。1902年,梁启超于《新民丛报》上发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其中这样道:

故世界愈文明,则豪杰与舆论愈不能相离。然则欲为豪杰者如之何?曰:其始也,当为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德,斯为完人。^⑭

包蕴于如此“过渡时代”之中,众人汲汲以求破旧立新,争作“舆论之母”,试图以自身观念指引时代思潮的未来走向。尽管在后人分梳时看似碰撞交融,多元共存,但就当时情景来说,打造舆论之母,首先就要抢夺文化思想高地,获取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话语权,所以论战激烈,分寸不得容让。如果说,批评的崛起,本身就反映一个多种声音、多种观念和多元文化碰撞和交融时代的到来,那么,在文化论争、思想论辩和观念争执中,双方从自身出发。“发声”何以“洪亮”,何以营造“共振”,就是其为扩大效应和影响力的鹄的。

在这方面,作为20世纪初为社会变革造势的时代喉舌,《民报》无疑不仅有比《新民丛报》更明确的政治主张,而且采取了更具革命性、更善于造势的策略,再加上更具有文化激情和想象力的批评文字,创造了前所未有、难与匹敌的宣传效应。

作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前身是宋教仁在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11月同盟会成立后,就将其作为革命造势的阵地,不仅以宣传“三民主义”为己任,大力宣扬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紧迫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且还发表了很多大力介绍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

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西方社会新文化和新思潮的文章,其中包括激进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来为中国革命运动和风潮造势。

《民报》并不是一家一般的文学或者文化批评的报刊,而是一家有明确政党归属和思想宗旨的机关报刊。正如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资料编辑组在《影印民报说明》中所言,在辛亥革命以前,《民报》“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它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在这一场斗争中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⑤。

值得注意的是,《民报》上发表的虽然多是政治性文章,所传达的也多是革命思想和观念,但是其叙述和言说气象和语调,却不乏文学性,甚至可说富于文学色彩,充满激越的情感诉求和感染力——这不仅是实现其“舆论之母”效果的必要条件,也是文学批评何以能够介入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场域,实现其社会价值的缘由。正是在这里,文学与政治再次体现了唇齿相依、相得益彰的关系,二者日益密不可分,文学由于政治变革的欲求而介入社会,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政治色彩。而政治诉求由于文学的推助和渲染,变得越来越充满文学性,甚至时常借助文学想象和张扬的方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这在1905年10月《民报》第1期上的《发刊词》和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在《民报》在东京召开的周年纪念大会上所作《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演说辞中就有表现。就以《发刊词》为例,其一开始就以做“舆论之母”为己任,力求“缮群之道,与群俱进”,“求其斟时弊以立言”,实现用“革新之学说,其理想输灌于人心,而化为常识”,进而付诸实践和实行的目的,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为革命、为新时代造势的气息,例如: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族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

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现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⑥

既然有了“舆论之母”,那么“舆论之仆”也就相继出现,一起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拓疆扩土,形成浩浩荡荡的蓬勃革命之势。在这种气势带动下,革命与文学得到了进一步的交织与互动,文学批评自然也充满革命的使命意识,当仁不让担负起了鼓吹革命的重任。

例如,由柳亚子(1887—1958)主编的《复报》^⑦则更接近文学刊物,其以“发扬民族主义,传播革命思潮”为宗旨,发表诗文、歌谣等,正如柳亚子在发刊词中所言,刊物就是“想靠文字有灵,鼓动一世的风潮”,以实现“救出我庄严的祖国来”的梦想。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具有普泛性的梦想和社会担当意识,文学批评渐渐远离了以作品鉴赏为基础的范式,进入为社会和公众事物呼号的场域,其评判和欣赏文学作品的标准和依据,也转向了对于自由、民族、民主、平等、进步等体现社会发展预期和要求的价值追求。这无疑营造了一个更大的文化空间和趋势,为文学批评发挥其推动社会变革效能提供了可能性。这样,20世纪初的《复报》不仅为革命造势立下汗马功劳,也成就了为革命造势的很多新的诗人和批评家。

柳亚子就是其中一位。在《复报》上,柳亚子就先后发表《立宪问题》《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吴日生传略》《中国灭亡小史》(署名“中国少年之少年”)《云间张女士传》(署名“焉是”)等论著和诗篇,传播革命理念,抒发革命激情,鼓吹革命思潮。从1903年初经陈去病等介绍加入上海的中国教育学会,到受教于章太炎,与邹容等为友;再到与陈去病、高旭等一起创建《南社》,柳亚子都在竭力鼓吹革命,为革命“悲歌慷慨千秋血”,谱写了中国20世纪“文采风流一世宗”的传奇。

这还不够，要真正成为“舆论之母”，占据文化领导地位，就不仅要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抢占理论观念的思想高地，还要争获一呼百应的效果，这样才能使革命主张化为社会行动，进一步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目的。于是，一场与1902年2月创办、由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的论战必不可免，因为此时的《新民丛报》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依然占据显要位置，依旧是鼓吹社会变革的主要喉舌和“舆论之母”，在公共文化场域掌握着舆论话语权。这不能不对《民报》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限制和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革命思想的张扬，遏制了革命思想的传播，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思想和理念，难以得到更有效的宣传效果，在社会上获得更广泛共识和响应。

于是，《民报》此时要成为新的“舆论之母”，就不能不打破这种限制和限定，攻取已经被《新民丛报》占据的舆论高地。为此，《民报》开办不久就发起了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1905年11月，《民报》创刊号即开始展开对保皇派的批判和驳斥，矛头直指仍占据意识形态高地的梁启超等人。梁启超不甘示弱，在《新民丛报》上连续载文反击，于1906年1月出版的第73号起连续登载《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伸张自己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先实行“开明专制”的理由。但是，这正好为《民报》创造了扩大战果的机会，1906年4月18日的《民报》第3号上用号外形式公布了《〈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并宣称“第四期以下，分类辩驳”，就“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的大问题，把论战推向如火如荼的状态。此举大大推升了《民报》在意识形态和公共文化场域的影响力。

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夺如何推进中国变革之话语权的论战。梁启超并不保守，但是由于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谨守和拘泥于“持论务极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等原则，不是以革命方式而是依赖学术和学理的方式议政参政，所以显得如同“小脚女人”，迎战仓促且放不开手脚，无论从观念和言辞都不能脱离旧的思路，不能拿出更有号召力的思想、口号和话语；尤其缺乏充满激情的感染力，所以不能满

足当时人们久被压抑和压制的、日益高涨的革命欲望和要求。而《民报》诸人则激情澎湃，不仅不惧专制权力的恐吓威胁，不拘于传统思想框架的禁锢和限制，不断在气势、话语和思想方面占据上风，而且抓住梁启超“借名保皇而行革命”之间的缝隙，穷追猛打，夸大“保皇”与“革命”之间的分歧，以“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淆”的逻辑，直指对方“失其初心，背其宗旨”，一下子就把梁启超和《新民丛报》推到了不容辩解的革命“公敌”，甚至“伪君子”境地。

如孙中山在《敬告同乡书》中所说：

梁为保皇会中之运动领袖，阅历颇深，世情浸熟，目击近日人心之趋向，风潮之急激，毅力不足，不觉为革命之气所动荡，偶尔失其初心，背其宗旨。其在《新民丛报》之忽言革命，忽言破坏，忽言爱同种之过于愚人光绪，忽言爱真理之过于其师康有为者，是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耳，非真有反清归汉、去暗投明之实心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康梁同一鼻孔出气也，康即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⑩

面对这种激烈论述和质问，梁启超很快就感到，在这一轮关于国家命运、“争舆论之动力”的论辩中，其自身的学术乃至政治诉求，在对方的同声呼号之下，已然声音渐弱，难以分梳，更难于为外在于论战场域的“观看者”们所信，自己不仅很难继续占据上风、把控话语权，在思想上再无险可守，无理可据，而且很可能在道义上彻底落败，失去过去已经获得的“改革家”“舆论先驱”的名声。

就这样，在创办《新民丛报》之初踌躇满志，想“献身甘做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的梁启超，很快就偃旗息鼓，接受败局。他万万没想到，才过了不几年，他的文化壮志，连同他的报纸和学说，皆成为新起的《民报》革命派同仁的“革命对象”，成为被迎头痛击的“万矢的”，此时似乎也唯有与论战者妥协和解，让出文化和意识形态领袖及其话语权，才能全身而退。

1906年5月，梁启超感到大势已去，就写信给徐佛苏寻求妥协，想停止与《民报》的论战。

但是又有他想不到的结果,当时浩浩荡荡革命思想洪流,早已经冲毁梁启超诸如所谓“持论务极公平,不贪偏于一党派”的禁忌与规则,以摧枯拉朽之势浩荡前行,容不得他说辩就辩,说停就停,因此他接连几次努力都遭到拒绝,包括孙中山、胡汉民、黄兴等革命领导人,皆采取了类似“痛打落水狗”“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态度,坚持把论战进行到底。

这种穷追猛打式的论战方式,当然有过度阐释、夸张与造势的批评倾向,但是,在当时语境中,或许只有通过夸张方式,由小见大,上纲上线,才能置对手于“遗臭万年”的死地,在思想、观念和话语上完全缴械投降,从此退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历史舞台。

至此,梁启超所秉承的以“学术之势力”左右中国社会变革的期许,变得渺茫且显得“落伍”,而“革命”则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主题词。

可见,所谓打造“舆论之母”的意识,最早发端于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的变化,体现为一种有组织、谋划、有共同社会诉求的集体或团体文化实践。在这种新的结合中,社团和报刊不仅是文化造势得以实施的胚胎和襁褓,也是文学批评得以新生和施展身手的地基和底座。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公共文化场域日益扩大和活跃,在近代以来吸引了更多文化人和民众的注意和参与,为顺应、迎合和满足“改良”“变法”“革命”实践的造势活动,也越来越多样化,不仅促进了文化社团和公共传播事业本身的发展,而且也为文学批评施展本领,扩大效应提供了用武之地。

这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先导性形成的基础和原因。在中国20世纪,所谓“批评的时代”,所谓文学批评在社会变革中先声夺人的效应,实际上都在传达和强化文化学术的传播功能和应用效力,不仅把文化学术及文学批评,推到了历史变革的前端和高地,赋予其无与伦比的社会和时代重任,同时意味着对时下猛士的呼唤和对文化英雄的造就——而文学批评无疑首当其冲,一直充当了造势、呐喊和冲锋陷阵的角色。

转引自周洋:《梁启超传》,第60页,第61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版。

- ③④梁启超(落款为“中国之新民”):《新史学:第一章中国之旧史学》,《新民丛报》第1号,第41—44页,第48页,1902年。
- ⑤梁启超:《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转引自《梁启超全集》第2册,第1029页,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 ⑥梁启超:《自励》(二首),原载《新民丛报》第1号,第78页,1902年。转引自陈永正选注:《岭南历代诗选》,第61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 ⑦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之左右世界》,《新民丛报》第1号,第70页,1902年。
- ⑧邓实(1877~1951),字秋枚,别署枚子、野残、鸡鸣,风雨楼主,广东顺德人。1877年生于上海。青年时崇拜顾炎武,常慷慨悲歌,期以报国。1902年创办《政艺通报》,宣传民主科学思想。后与黄节、章太炎、马叙伦、刘师培等创立国学保存会、神州国光社,出版《风雨楼丛书》和《古学会刊》,主编《国粹学报》,颇有影响。
- ⑨⑩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光绪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第七》,第171页,第17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版。
- ⑪鲁迅:《热风·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第32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⑫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的讲话》,《黄兴集》,第2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 ⑬黄兴:《〈国民〉月刊出世词》,《黄兴集》,第315—317页。
- ⑭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新民》,《新民丛报》第1号,第90页,1902年。
- ⑮《复印民报说明》,《民报》(一),第1—2页,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 ⑯《发刊词》,《民报》第1期,1905年。
- ⑰《复报》,1905年由柳亚子、金松岑等创办,先后分别在上海、东京编辑、出版和发行,撰稿人有陈去病、金松岑等,立足于宣传革命排满,抨击君主立宪,发表了诸如《驳梁启超书》《立宪驳议》《新民丛报非种族革命之驳议》等很多支持和附和《民报》立场的文章。
- ⑱孙文:《敬告同乡书》,孔范今主编:《百年大潮汐——20世纪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文录》,第484页,泰山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萨支山

①②梁启超:《本报告白》,《新民丛报》创刊号,1902年。